

先把灾难当灾难,才会有反思

但愿这场夺走14人生命的大火,能够唤醒更多的官员,把灾难当成真正的灾难去处理,推动城市管理的改进,以此来告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。

□本报评论员 姜士强

14日早晨6时左右,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发生火灾,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,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。当地媒体次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关于此事的官方表态,其中半数以上的文字是在描述当地各级官员的“辛苦”。

在充斥着“迅速”、“立即”、“全力以赴”、“细致周密”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,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“积极行动”,没有一点反思的迹象。

在官方自我总结中,除了对领导的仰望,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,诸如“好的哥哥出多个伤员”、“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”这样的内容,都成了这次火灾的“亮点”。似乎有了这些正面形象,就可以无视城市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。而从襄阳之外的媒体那里,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,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,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。按理说,襄阳各级领导迅速赶到救援一线,官方对于这场灾难的了解更为深入,但是,文过饰

非的官方表态,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,也有违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规律,既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,也助长了“消防栓无水”等谣言的传播。

灾难的发生是任何人都不能看到的,要想避免悲剧重演,就必须从反思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。从其他媒体公开报道中,人们已经能够了解到很多官方不曾或者不愿提及的细节,正如襄阳政府在回答质疑时所说,低效的消防车辖区管理原则、对网吧凌晨营业的监管不力等,都是酿成这

场火灾的人为因素,城市管理的水平正是在这些细节中体现的。对于襄阳市来说,还有多少网吧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,消防车能否采取效率更高的管理模式,市民在灾难中的自救能力如何提高,都应该通过这场火灾及时进行反思。也只有正视存在的问题,才有可能纠正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偏差。

相反,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“护身符”,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,也被白白浪费了。在官方

表述中,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,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,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,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,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中的英雄。既然坏事变成了好事,哪些部门失职,哪些领导需要为事故负责,也就没有追问的必要了。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,政府没有改进工作的动力,城市管理还怎么提高呢?可以预见的是,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排查行动过后,这场

灾难带来的伤痛,很快就会被遗忘。如果将来再发生一场类似灾难,恐怕又要祭出官样文章的“传家宝”了。

让人略感欣慰的是,襄阳当地官方对于来自媒体和民间的质疑并没有置之不理,事后还是做出了解答,这种“亡羊补牢”的态度是个好的开始。但愿这场夺走14人生命的大火,能够唤醒更多的官员,把灾难当成真正的灾难去处理,推动城市管理的改进,以此来告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。

社会若无鸿沟,职校生才有尊严

让职校学生获得尊严的最有效途径还是弥合社会阶层的鸿沟,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认可,并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,不因学校教育确定终身不变的社会身份。

□本报评论员 崔滨

“说起职业教育来,大家都认为很重要,可打心眼里,又都瞧不上,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、市长的孩子上职业学校。”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长的纪宝成,15日通过媒体表达了眼下职业教育日渐沦为“平民教育”的窘境。

这的确是当下中国职业教育的困境,一方面,国家经济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与

日俱增,我们不时看到很多企业为焊工、钳工、厨师这些技术岗位,开出远远高于应届本科生的薪酬;但另一方面,读职业学校却是很多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长,在选择学校时最后的、最不情愿的选择。

造成这种职教怪现象的,首当其冲是考试录取制度,仅仅“高中、高校优先录取、职业学校最后录取”这一条,就粗暴地“一棍子”将职业学校打入底层。久而久之,

上职业学校成为“差生”、“考不上学”的代名词。另外,收入分配制度、职业晋升机制等一系列政策,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滞后和调整不到位,使得“蓝领”技术人员在与“白领”的对比中日渐落于下风。除了教育体制内的不公平,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,更加让职业教育倍受歧视。调查数据显示,近三年来,88%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。2012年,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

总数的82%。

就像纪宝成发现的,30年前还争着把孩子送入职业学校的领导干部,如今却避之唯恐不及。哪怕自己的孩子考试分数就应该上职业学校,这些领导干部也会想方设法通过出国留学等方式让孩子避开。原本职校毕业生就在社会上“矮人一头”,如今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权力精英,又屡屡在教育领域中为子女上演“权力改变命运”的奇迹。权力对职业教育“翻

白眼”,加剧了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和偏见。如果说当初进入职业学校只是一种无奈,那么面对无力改变命运的现实,平民子女注定会更加失望。

其实,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,不仅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者礼遇有加,即使现代社会也不乏让人敬仰的劳动模范。虽然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一样可以有出息,但也没有必要强求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上职业学校,毕

竟父母不能代替子女做出人生的选择。众多平民家庭子女更盼望的是,手握权柄的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,不为子女的升学就业动用权力资源,让子女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竞争中来,努力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。当然,让职校学生获得尊严的最有效途径还是弥合社会阶层的鸿沟,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认可,并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,不因学校教育确定终身不变的社会身份。

公民论坛

“最低消费”去留不妨交给市场管

□晏扬

北京市消协日前向商务部递交建议函,建议在即将出台的《餐饮业管理办法》中明确禁止餐饮业设置最低消费。此前,商务部相关人士表示,包间费和最低消费都是针对餐厅包间消费,两者应只收其一。北京市消协认为,如果允许两者收其一,将会使最低消费“合法化”,有悖于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。(4月15日《新京报》)

眼下厉行节约之风劲吹,餐饮业的最低消费犹如过街老鼠,呼吁取消的声音

十分响亮。北京市消协的调查显示,有92.06%的消费者遭遇过最低消费,更有97.22%的消费者认为最低消费不合理。消协上书反映民意,其良好初衷自不待言,但有必要提醒的是,越是群情激愤之际,往往越要保持清醒头脑,正因为反奢侈浪费这面大旗无比正义,所以尤须防止权力趁机扩张、逾越边界,去管不该管的事情。

餐饮业的最低消费是否合理,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会有不同答案。餐饮是充分市场化的行业,在明码标价

的前提下,遵循“愿打愿挨”的交易原则,消费者有着充分“用脚投票”的自由:若觉得最低消费不合理,可以选择在大厅里消费,甚至拒绝光顾;反之,若仍愿意光顾并接受最低消费,说明这家餐厅有吸引人的地方。至于商家是否设置最低消费、设置多高的最低消费,也是依据市场需求和生意好坏而定。如果这些均可由市场调节,那无须也不该由行政权力过度管制,现在要做的是“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”,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。



画评

对跪

据4月15日《武汉晚报》报道,武汉城管曹祥超在巡查时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摊贩推着一辆小推车占道卖菠萝,为了避免他再次占道,曹祥超决定对其小推车进行暂扣。摊贩与曹祥超交涉时突然下跪求情,为了不引起围观市民的误会,曹祥超也跪在了地上对其劝解。

漫画/赵国品

8个“办公室”是权力在“躲猫猫”

□张枫逸

一般情况下,办公室门上往往会标明主人身份,但在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办公楼,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,6个局领导的办公室隐藏在其中。来办事的群众说,这简直就是“迷魂阵”,办事不知该到哪儿找人。(4月15日《新京报》)

“门难进,脸难看,事难办”,是群众对于一些单位衙门作风的精辟总结,如今,对于柳州住建局来说,还要再

加上一条“门难找”。这类“躲猫猫”现象,大抵出于三种心态。一是摆架子。在一些人看来,领导就要高高在上,领导的办公室就应多些神秘色彩,普通群众要想见领导,必须经过门卫、办公室、秘书等层层环节,岂能径直到领导房间推门而入?二是嫌麻烦。一些官员乐于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,做个清闲官、逍遥官。三是不自信。群众要直接找领导反映的,要么是部门工作存在过失,侵害了群众利益,抑或是群众遇到了棘

手问题,需要领导出面协调。然而,一些干部缺乏直面群众,坦然纠错的勇气,缺乏迎难而上、斩断乱麻的能力,只好高悬免战牌。

最近,多地纪检部门通过暗访方式监督管理公职人员,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。其实,记者和群众更应成为暗访者,毕竟,他们采访和办事的切实感受,才是政府部门作风的真实原生态。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齐鲁视点

□何足道

在泰安市泰山区作风建设推进会上播放的暗访视频,恰如响鼓重锤,对与会干部产生了强烈震撼。该区领导关于加强检查监督、做好整改的表态,也透露出动真格的决心。(详见本报今日A03版)

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出台

改作风就要动真格

后,各地纷纷出台实施细则,并狠抓落实。也要看到,一些地方改进工作作风出现“一阵风”的问题,如何避免抓一抓有好转,松一松就反弹?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动真格。泰安市泰山区的做法值得借鉴。

动真格需要制度保障。违规之后如何处理,需要有严密的细则。对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,有些很难量化考核,但能够量化考核的应该量化,能够明确原则性处理办法的应该明确。有了铁

腕,出手才有力,才能收到实效。

动真格需要加强监督。纪检监察机关应该通过暗访、受理举报、搜集网上民意等办法,让少数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受到惩处,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起到震慑作用。

动真格需要领导带头。以令率人,不若身先。领导干部带头接受监督,带头树立良好作风,能够带动形成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的良好作风。